

展望中国

未来十年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的挑战

CHINA'S ECONOMIC & SOCIAL CHALLENGES For the Next Ten Years

主 编 / 黄朝翰 杨 沐

劳动力供给正在从无限向有限转化，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的负担越来越重，巨额外汇储备如何保值，世界经济增长格局急剧变动……中国如何面对，如何在持续的经济发展中逐步解决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展望中国

未来十年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的挑战

CHINA'S
ECONOMIC & SOCIAL
CHALLENGES
For the Next Ten Years

主 编 / 黄朝翰 杨 沐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ER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展望中国——未来十年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的挑战/
黄朝翰, 杨沐主编.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8. 2

ISBN 978 - 7 - 5096 - 0138 - 9

I. 展... II. ①黄... ②杨... III.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 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2799 号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电话: (010) 51915602 邮编: 100038

印刷: 北京市银祥福利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组稿编辑: 陆雅丽

责任编辑: 刘其昌

技术编辑: 黄 铄

责任校对: 超 凡

720mm × 1000mm/16

15.25 印张

211 千字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书号: ISBN 978 - 7 - 5096 - 0138 - 9/F · 138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

负责调换。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前言：拐点正在出现，中国如何面对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1978 ~ 2006 年 GDP 年均增长达到 9.7%，经济发展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这种高速发展的青春期还能维持多久？拐点（或按华人的习惯说转折或转型）将会何时到来？胡锦涛主席在 2005 年的讲话中就已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平衡的发展”和经济的长期的可持续性，以解决中国在经济结构上的不平衡，和处理好它在增长中的社会问题。经济的转型正在出现。

一、中国正在出现的拐点（转折）

在发展经济理论中，有一个大家熟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的增长模型：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入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转入向劳动力的有限供给的转化阶段，会出现经济发展的拐点（turning point）。如图 1 所示，^① 从 0 点到 L2 点，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阶段，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新增劳动力，能源源不断地从传统的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中转移出来（劳动力在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为零，即 $MP = 0$ ）。随着经济的发展，就业在不断上升，但工资收入却维持不变。但到 L2 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已基本完成，随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进一步的劳动力投入，需要从现有的就业中

^① Benjamin Higgins. *Economic Development: Principles, Problems, and Policies*, Norton & Company, Inc., 1968, USA. pp. 305 - 318.

进行调整。工资收入的提高，成为这种调整的必要前提。低价劳动力的黄金时期开始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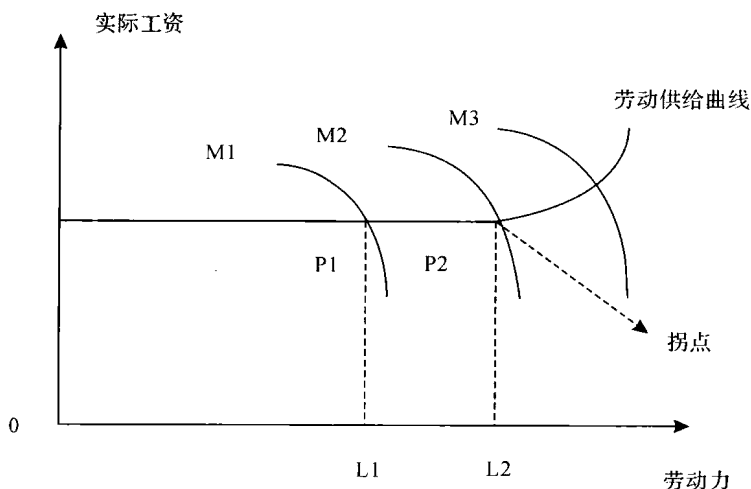


图1 刘易斯二元经济增长模型

中国是13亿人口的大国。每年新增人口1000万人。改革开放初期，农业中曾有5亿多劳动力。但经过这30年的变迁，2亿多进了城市就业，1亿在农村地区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还有几千万的流动农民工，继续在农村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还有1亿多。按中国社科院研究人员在2006年的调查，许多农村地区，有移动能力的劳动力，已经转移出去了70%~80%。中国的城市失业率，从前几年的4.5%，降到今年的4.0%。这些数据和迹象表明，尽管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可以持续近三十年的低工资的高速增长，但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向有限转化的拐点L2，迟早还是会出现。而在经济活跃，需要新增劳动力多的地区（如深圳、广州、上海）和行业（如家庭保姆、建筑工）等，会首先出现。

中国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发达地区，首先开始受到劳动力和土地的有限供给，环境和生态的有限容量的挑战。在这些地区的

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得不开始向内地，甚至向东南亚等地转移。和日本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四小龙”在八九十年代的转型相似，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将会加快。在生产能力转移出去以后，发达地区将保留企业总部、研发中心、设计中心等，同时要加快发展为这些总部和中心服务的金融服务、财务服务、法律服务、物流服务、休闲服务、培训服务、会展服务、环保服务、生态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中国服务业占 GDP 和就业比重的上升速度将会加快，制造业的比重将会开始下降，经济结构将向现代结构靠拢。

刘易斯还曾指出，发展过程会内生地产生不平等，因为发展不可能在一个国家的所有的地方同时产生，给所有的人民和阶层同时带来同样的利益。为了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一定需要使资源集中到有效的使用者手中。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正是符合这一理论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一方面，已经建立的市场机制和市场竞争，将促进资源的有效使用；另一方面，贫富差距的扩大，弱势群体的不公平待遇，已成为越来越大的社会问题。中国在近几年，在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下，正在进一步推进教育体制、住房体制、医疗保险体制和养老保险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力求让弱势群体有起码的生活保障、教育条件和努力成功的机会。

最近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提“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不仅确认了以财产投资所获得的收入的合法性，而且意味着中国今后的目标，是要让多数人而不是一部分人富裕。但是，任何一项制度的安排，都会有它的负面性。财富创造财富能让更多人富裕，但其负面性，是会扩大富人和穷人间收入差距。这是现代社会中的世界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不是需要又一次革命，推倒重来，回到改革的起点，而是在分配政策上，如何在更多的社会财富积累中，合理地取出一块，帮助穷人，帮助弱势群体，让他们也能创造条件，进入财富创

造财富的行列。近些年，中国在二次分配上，已采取了一些办法，如取消农业税，实行全民低保等。“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在一次分配上提出了若干可能的措施。其他进一步的制度创新，如实行奢侈消费税、累进消费税等，让富人拿出更多的钱来帮助穷人都是有可能的。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曾经说过，收入分配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条U型曲线：在发展前收入分配可能是平等的，随着发展分配会越来越不平等，但在最后，收入分配会由于进一步的发展，又变得平等起来。用这种观点来看，中国过去的发展中存在的地区不平衡既是严重的，也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所不可避免的。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了多个“地区发展战略”，如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这些都需要经过多年的努力后，才能看到具体的效果。

从1990~2005年，中国企业营业余额占GDP的比重上升7.7%，但企业就业人员的报酬在GDP中的比重下降12%，^①即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就业人员的工资增长，受到待业人员的压力。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享受着人口红利，^②而且享受着可延缓收入增长，压低消费，把更多的新增财富用于加快积累和投资的“资金红利”。但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结束，这种红利时代将很快消失。

在“资金红利”的有利条件下，近十多年来，中国政府的财税收入的年增长幅度，一直都是GDP增长幅度的两倍左右，2007年1~9月更是高达31%。这在世界各国是没有的。日本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时期，政府财税收入的年增长都没有超过GDP的年增长。随着中国的“资金红利”年代的结束，从财政收入方面看，中国的财税年增长幅度将会比现在大幅度降低，同时，从支出方面看，社会保障

① 金碚主编：《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② 请读本书第二部分第三篇文章：“人口红利”递减对中国增长可持续性和地区差异的影响。

的负担将急剧增大，帮助落后地区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负担将急剧增大。习惯于大手大脚，搞大手笔、大项目的中国各级政府，能不能在有效帮助穷人，帮助落后地区的同时，避免重蹈西方福利国家的覆辙？中国将面临着新的考验。

从对外经济来看，中国的外汇储备已高达 1.4 万亿美元，而且还在继续高速增长。这引起了国内货币的流通性过剩，并造成持续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外贸逆差的根本原因是多边贸易条件下的两国的产品竞争力的差距。仅仅依靠人民币加速升值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日本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经验教训早就说明这一招不仅是没有效的，而且过快地升值会加大日本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增加经济的风险。用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和增加进口的办法，能缓和逆差，但还需要有解决国内流通性过剩的良策，双管齐下。近些年，中国正在采取或准备采取的一些办法，如外汇管理的严进宽出，扩大国内居民每年可购买外汇的额度，扩大 QDII 的额度，建立中国外汇投资公司（CIC），鼓励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在世界市场上购并（Merger & Acquisition），开放居民购买港股的金融直通车……这些都是表明中国对资本账户的管理正在从过去的关闭型转向逐步开放。

和过去十多年的强势美元不同，美国在外贸逆差和次贷风暴的压力下，正在持续走向弱势美元。美元的世界货币霸权地位正在下降，美元作为世界性的结算货币的地位正在产生动摇。更多的企业，会选择欧元，甚至人民币。在港澳、越南、缅甸、泰国等周边国家和地区，会有更多的人民币在流通，在作为结算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已不完全是中国自己可以选择或决定的事情了。从最近的一些数据来看，美国 2008 年经济增长可能只有 1%~2%，美国的股市有可能从连续五年的牛市转入熊市。未来的世界经济将更依赖于中国、印度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带动。正如亚洲金融危机，无意中把中国推到亚洲经济的前沿；西方国家因次贷而出现的信用危机、金融危机，正在把中国和新兴经

济体推向世界经济的“驾驶座”(driving seat)。

这种世界经济增长结构的急剧变化,并由此带来的资本流动的急剧变化,对每个新兴经济体既是机会,也是极大的风险。第一个卷入亚洲金融危机的是泰国,其原因之一,正是资本账户开放得过快、过早。当世界要把中国推向前沿的时候,中国准备好了吗?

二、东亚经济体的经验和教训

按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所有国家和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面临发展中的拐点。日本经济学家们提出的“雁行理论”(Flying Geese),实际上就是日本、“四小龙”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于进入经济起飞阶段的时间上的间隔,形成面对拐点和进入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时间梯度。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转型中已经有的经验教训,是值得后发国家重视的。

新加坡在经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成功转型后,连续遭受外部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和2003年的“非典”事件等的冲击,新加坡经济的增长幅度急剧下降。但到2005年、2006年新加坡的增长速度,又再次达到6.4%、7.9%,2007年预计为7.5%。不仅高于其他的四个老东盟国家(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而且远远高于其他的新兴工业国和地区(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

这是因为经过在多年困难中的持续努力,新加坡经济中开始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如当前正在建设的现代休闲、娱乐、会展中心;已形成的生物科技、生物制药研发中心;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制造中心;以个人理财为主的东南亚金融中心;为中国、印度、海湾国家等新兴经济的起飞提供帮助的服务中心等。这些新的增长点已经取代或正在取代原有的电子、石油、化工等领先行业,带领新加坡进入了一个经

经济增长的新周期。新加坡的经验说明，进入一个拐点后，并不一定会从原先的高速增长转为长期经济低迷，即使是人均收入已达到 3.1 万美金，只要有正确的政策，还是有可能找到新的增长点。

日本则是另一方面的例子。日本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起飞后，1968 年就成为世界 GDP 的第二大国。1974 年参加七国峰会，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三级。日本产品迅速涌进世界各国市场，引起各国的恐慌，媒体上把日本称为经济动物（和现在欧美市场对中国产品的恐惧非常相似）。美国和西欧国家迫使日本在 1985 年签下广场协议，大幅度提高汇率，1 美元从 1985 年的 250 日元，迅速降到 1986 年底的 120 日元。一年多时间里日元升值 100%。而日本政府为了刺激产业升级，实行经济转型，鼓励企业购买先进设备，把银行利率于同一时期，从 5.0% 降到 2.5%。日本市场上出现流动性过剩，银行追着企业和有钱人给贷款。经济进入“平成景气”时期，国内国际一片叫好声，没有人预感到日本经济会有一天出现困境。

日本企业和个人都突然感到很有钱，开始向海外投资。一部分是向欧美，如丰田、本田向欧美投资设厂，开拓欧美市场；也有投入房地产和媒体娱乐业，如购买纽约洛克菲勒中心，购买 21 世纪福克斯美国著名电影制片公司等。另一部分投资则投向“四小龙”和东南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片喧闹声中，日本公司并没有实质性地进入欧美的金融业、制造业和销售渠道，没有能全面性地改造自己成为全球性企业（除汽车行业）。

在日本国内，过分充裕的资金大量地流向股市和房地产。日本当时允许以股票和不动产抵押贷款，形成购买—抵押贷款—再购买的恶性循环。日经指数，从 1970 年的 2000 点上升到 1984 年的 10000 点，又用了近两年升到 2 万点，最后，从 1988 年初到 1989 年底，又用了近两年上升到 4 万点。日本的土地资产总值，从 1981 年到 1988 年上升了 4 倍。

面对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过热，日本政府在1989年4月开始禁止不动产抵押贷款，又在1989年5~8月短短3个月内，将利息率从3.25%提高到6.5%。原来的恶性循环被一下打断，流动性过剩迅速转为流动性不足，信用危机爆发。从1990年初到1992年，日经指数从近4万点，暴跌到2万点以下。从房地产市场危机、股市危机、信用危机，扩展到银行危机，新投资意愿急剧下降，市场需求不足，经济进入长期低迷。直到现在日本的股市都一直没有恢复到超过2万点。

对当前的中国经济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的基本面有什么不同，还可做更多的深入分析。但从上面这些简短的叙述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在经济转型中，有没有有预见性的对策，或能否在出现问题后，沉着应对，找到正确的决策，会引起两种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的后果。

三、用转型来面对拐点

本书是东亚所建立十周年研讨会的论文集。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中国的未来十年。参加会议的学者和专家，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同角度，不约而同地都在发言和论文中探讨了中国如何以转型来面对正在出现的拐点。

高尚全有着长期的在政府领导岗位上的政策制定和操作的经验。他认为，要把过去的管制型的政府转变为服务型的政府，把无限的政府转变为有限的政府。把政府的主要职能、主要的财力集中到为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上来。他认为，值得关注浙江的现象。这是一个人多地少、资源少、国家投入少的省份。为什么浙江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地走在全国前列，重要的原因是浙江初步形成了一个民本经济的格局，是一个以民为本，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让老百姓自己来创造财富，拥有财富，这样的经济才有内在的动力、活力，才

有未来。

薛澜和胡颖廉在论文中说，中国的发展应实现从速度型向规制型的转型。规制型发展强调以人为本，要逐步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要建立一套各方利益均衡协调的规制体系，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的积极作用。

王绍光在论文中强调指出，市场力量的扩张，会引发旨在保护人、自然和组织的反向运动。市场是必要的，政府需要从过去管得过多、过细的微观经济领域和个人的社会活动领域退出，让市场机制和法律去发挥作用；但另一方面，需要政府通过再分配，尽力将对人类生存权利相关的领域“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分享市场运作的成果，让社会各阶层分担市场运作的成本。他列举了大量的文件和数据，说明尽管今天中国社会还存在着大量严重的问题，但转型已经开始出现。中国政府有意愿也有财政能力来实现这一转变。

余永定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东亚模式，在过去获得了很大成功，但它的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越来越大，实际上是中国不断地用自己的出口交换美国政府的借据。这种增长模式必须改变。中国需要加快人民币的升值，同时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吸干过剩的流动性。另外，需要坚持银行改革，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尽管中国目前并不面临另一场东亚式的金融危机，但中国需要居安思危，做好准备，这才可能避免危机。

汪同三的文章分析了中国当前面临的结构矛盾，增长方式粗放，涉及百姓的利益问题解决得不好，还存在着投资、货币供给、外贸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问题。他认为只要加强宏观调控，持续改革，调整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中国“十一五”规划的指标都将是完全可以完成的。

陆丁认为，过去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期间，“人口红利”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根据数据资料，转折正在出现，“人口红利”正在迅速消

逝，人口结构正在迅速老化。尽快为老龄化的人口提供社会保障已是一项迫切的任务。但这种体制应该建立在动员储蓄而不是代际财富的转移机制上。中国现有的储蓄率已经很高，投资长期过热，不可能再进一步提高储蓄率，扩大投资，出路只能在提高投资和资本的形成效益上。应对这一挑战，中国需要一个有效的银行体制和金融市场。

洪银兴的论文认为，区域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特点。进入21世纪后，长三角地区引领全国的地位明显凸显，同时原有的原材料供给和产品市场两头在外的制造业基地的模式，受到劳动力和土地的有限供给、环境和生态的有限容量的挑战。长三角需要将部分生产能力转移出去，在区域内保留企业总部、研发中心、设计中心及品牌等知识产权，把长三角内部的一体化与全国的供应链整合结合在一起，腾出有限空间，发展高层次的新型服务业。

景天魁分析了中国当前的社会利益关系中存在的 unfair 性、敏感性、复合性，利益诉求的联动性和利益冲突的易发性。认为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已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政府迫切需要建立面向民生的财政体制，由政府按底线公平的原则，进行二次分配。保证民众的生存需求（基本温饱）、发展需求（基础教育）和卫生医疗需求（基本健康）。实现四个原则，一是弱者优先，二是社会补偿，三是政府责任，四是持久效应。

陆学艺的论文考察了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指出这种历史性的转型是和体制转轨同时进行，互为因果的。现存的城乡发展不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区域发展不协调等诸多矛盾和社会中间阶层还没有壮大起来有关，主要是改革滞后引起的，必须破除条条框框，深化改革。

李强和叶鹏飞的论文考察了中国城市社区的历史性转变。以单位为主的集体院落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社区呈现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包括新型物业小区、旧城传统社区、单位型社区、城乡接合部社区、混

合型社区等。社区管理的模式，出现了哈尔滨模式、沈阳模式、上海模式、深圳模式和武汉模式等。管理体制出现了法制化、规范化、自治化和多样化。表明一个新的社区建设时代已经到来。

邱泽奇则从技术的角度，考察了技术应用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他分析了杂交水稻技术、纺织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中国社会的就业结构、居民消费和生活方式、信息交流方式的影响，进而显现出社会的变迁。其关系来源于技术的可扩散性和社会对技术应用需求的层次和程度。越是可扩散的技术，且社会需求层次越高，与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迁之间的关系越紧密。

这些理论的探讨，尽管很初步，有些可能不完善，甚至不正确，但都是努力在探索正确的决策，来应对正在出现的转型和挑战。

四、从第三只眼看中国：东亚所的研究视角

新加坡东亚所是在由新加坡原常务副总理吴庆瑞博士创建的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的基础上，于1997年正式成立的。吴庆瑞博士在20世纪80年代曾任中国沿海开发办的顾问，凭借新加坡的发展经验，他在80年代就已预见到中国的崛起，认识到这既是中国的机会，也是新加坡和东盟的机会。在他的建所方针的指引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东亚所已建成为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重镇。东亚所的学者活跃在学术刊物、媒体、各种研讨会和政府及企业的咨询会议上。东亚所也通过自己举办的各种学术活动和聘请短期研究人员，联系了海内外一大批有为的专业人士。

几年前，中国曾流行过一本书，书名是《从第三只眼看中国》。正如新加坡李光耀先生在东亚所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所说，中国是一个大国，政府需要在持续经济发展中解决好各种社会问题，中国的民主改革会需要较长的过程。东盟国家把中国的崛起看成是促进东盟形

成统一市场，加快经济发展的机会；“中国领袖可能也已经认识到发展和东盟的多边关系，能增强世界对中国的和平崛起的信心”。从东盟和新加坡看中国，具有和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等国不同的视角。如果把中国对自己的观察作为第一只眼，欧美日等国作为第二只眼，东盟和新加坡正是实质上的第三只眼。这是东亚所的研究所以得到中外各国重视的最主要的价值。

东亚所热诚欢迎世界各地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有研究的、能以英文作为工作语言和交流语言的专家，特别是中青年专家，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的网址是：

<http://www.nus.edu.sg/NUSinfo/EAL/>

编者：黄朝翰、杨 沐

目 录

第一部分 中国政府的体制改革

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高尚全	3
从速度发展到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建设面临的 公共管理挑战 薛澜、胡颖廉	7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大转型中的 双向运动 王绍光	30

第二部分 经济高速发展的可持续性

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余永定	67
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未来展望 汪同三	80
“人口红利”递减对中国增长可持续性和 地区差异的影响 陆丁	96
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和范围经济 洪银兴	116

第三部分 经济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以底线公平为原则调整社会利益关系 景天魁	135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陆学艺	145

中国城市社区与管理体制的变迁 李强、叶鹏飞	160
技术应用与社会变迁——中国的例子 邱泽奇	195